



# 讓漢語文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 漢語文問題討論集

---

孔憲中 (等) 著 胡百華 主編

商務印書館

# 讓漢語文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

## ——漢語文問題討論集

---

孔憲中(等) 著

胡百華 主編

版 權 人 :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出 版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芬尼街 2 號 D 僑英大廈

印 刷 :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B1

版 次 :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1997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4304 0

Printed in Hong Kong

**Problem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 Anthology**

by Hung Hin-chung, et al.

(Edited by Jerome P. Hu)

Copyright: The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of Hong Kong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 讓漢語文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 漢語文問題討論集

# 前 言

在香港出版廣為流傳的一些語文刊物，多年來致力於語文建設的討論，敢於發掘和正視漢語文的問題，故海內外都有朋友建議，把其中一部分文字集合印為單行本，俾各界對這些問題有個回顧和進一步了解的憑藉。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同仁對此深有同感，經過近兩年來的努力，現在已有具體進展，這就是取得香港商務印書館支持出版的這本專集。

這本專集的編輯，係以孔憲中先生在香港各語文雜誌發表的文章為中心，加上同一時期語文界多位專家的評辯、申論、闡述等，匯聚在一起而成的。因此除了孔先生之外，我們同時得感謝下列各著作人：

陳克峰先生 高萬雲先生 胡百華先生 黃河清先生 姜玉星先生  
李海先生 李樂毅先生 李業宏先生 李友仁先生 劉涌泉先生  
呂觀雄先生 裴毅然先生 屈承熹先生 申小龍先生 史有為先生  
王永成先生 吳思華先生 吳文超先生 薛俞笙先生 姚德懷先生  
周國正先生 左思民先生

謝謝周有光先生為本書寫序，這位語文建設泰斗對本書所討論的問題，數十年來都具有濃厚的專業興趣，也發表過不少其他傑出的見解。我們還得特別感謝劉涌泉教授的特約專文。

本書的出版，蒙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及其發行的《語文建設通訊》全力合作，特別是該會的姚德懷先生、田小琳先生和游社煥先生的實際參與各項工作。其實，他們三位和孔先生都該共同列為編者的。

主 編  
1995年6月

# 周有光序

本論文集分前後兩個部分：前一部分是孔憲中先生的語文論文選；後一部分是由孔先生論文引起的討論文章。孔憲中先生是一位哲學家，他在新西蘭長期擔任哲學教授，在香港支持“香港中國語文學會”促進語文現代化的研究。他用宏觀的思考方法研究中國的語言和文字問題，提出不同凡響的見解。他的治學精神值得欽佩。

孔先生高瞻遠矚，從世界看中國、不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語文看中國語文、不從中國語文看中國語文。例如，有人說：“二十一世紀是漢字漢語發揮威力的時代”；“全世界的人民將必修漢語，並以漢語語音來聲控計算機”。這些豪言壯語可以使不假思索的炎黃子孫感到一陣痛快。但是，從世界看中國，事實否定了這種樂觀遐想。請看聯合國六種工作語言的使用率：英語佔80%，法語佔15%，西班牙語佔4%，俄語、阿拉伯語和漢語三種語言合起來只占1%。歐美學生學習漢語的人數逐年在增加，但是學習日語人數的增加是漢語的三倍。統計說明，提高漢語漢文的國際地位，除跟政治和經濟有關外，必須實事求是地進行語文的規範化和現代化，閉目遐想是無濟於事的。

孔先生打破圖騰迷信，敢於“太歲頭上動土”，提出前人所不敢正視的一些問題。五四時代有人說過，“孝順父母”是對的，可是“天下無不是之父母”是錯的，指出父母的“不是”不等於“不孝”。孔先生的“罵祖宗”就是指出傳統的漢語漢文之不足。不敢指出傳統之不足，還談甚麼現代化？在古代，中國人說“一點一劃無非地義天經”，外國人說“改一個字母就會天崩地裂”。這些話在古代就是錯的，到今天更是大錯特錯。“滿招損、謙受益”，這個古訓才是值得奉行和弘揚的真理。

我自己也犯過盲目自信的錯誤。從前人家問我：漢語詞彙是否比英

語貧乏？我總是說：不對，如果貧乏如何能翻譯英文呢？現在我知道我錯了。請看《漢語大詞典》（1994），收詞目“約三十七萬條”（古今兼收，古多於今），這是收詞目最多的漢語辭書。再看《韋氏第三版新國際英語詞典》，收詞目“四十五萬條”（不收古英語）。漢語詞彙比英語貧乏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許多英語的“詞”在漢語中是以“說明”來翻譯的，不是以“詞”譯“詞”。例如：mall譯作“購物中心”，這是“說明”，不是“翻譯”。

中文所以詞彙貧乏，原因之一是中文抵制“音譯詞”。日語勇敢地吸收大量“音譯詞”。看看日語外來詞的詞典又多又大，就可以知道日語詞彙超過了漢語。其實，只要放棄墨守成規，大膽引進外來“音譯詞”，詞彙是不難迅速豐富起來的。

孔先生勇於探索，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心有所思，隨手筆之於文，反對藏拙，反對嘵取寵。“探索”就是“嚐試和錯誤”。不怕錯誤，才敢嚐試；不怕失敗，才能成功。“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我的失敗就是你的成功借鑒。這是一條現代科技前進的道路。如果愛惜羽毛，藏頭掩尾，個人也好，國家也好，必然寸步難行、依然故我。

孔先生胸襟開闊，容納爭議，歡迎批評，接受修改。他是百家爭鳴的實踐者。本文集裏刊載不同和相反意見的文章，就是證明。但是，批評可以普遍歡迎，修改必須經過自己的邏輯思考。

不同的文化相互接觸，必然引起彼此比較，不僅認識到各自的特色，還認識到各自的優點和缺點，於是要求取長補短，除舊佈新。這是社會發展的經常道路。對於語文來說，同樣逃不了這個規律。可是，語文跟圖騰向來緊密結合。一提到語文的優劣比較，就有人情緒緊張、理智錯亂。因此語文的革新難於進行，欲行又止，半途而廢，甚至進一步、退兩步。中國有“厚古薄今”、“托古改制”的傳統。明明是“革新”，也要說成是“仿古”。研究古代是學問，研究現代不算是學問。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這是重要原因之一。用孔先生的宏觀思考方法，就能打破這種傳統的思想束縛，才能了解正在迅速興起的新時代的

新事物。

下面，我借此機會，嘗試用孔先生的宏觀思考方法觀察兩種最近出現的語文新現象。

一種是中文中間近來湧現出外來詞“音譯化”和“字母化”的新現象。這也是孔先生所關注的問題之一。

信息化時代是瞬息萬變的時代。新事物不理睬舊時代的阻力而倏然興起。新興的青年一代勇敢地走上了信息化的高速公路。清末民初，大量翻譯日文書籍，引進大量日語借詞，例如“社會學”（不用“羣學”），“物理學”（不用“格致學”）等等。今天，大量翻譯英文計算機學術書籍，正在大量引進用字母拼寫的音譯詞：“字母借詞”。這是一件許多人還來不及刮目相看的新事物。

舉一個例子：電子工業出版社（北京）新近出版一本《Internet 半月通》。書名中就用了“字母借詞”（不用意譯詞“互聯網絡”）。目錄中有許多“字母借詞”。例如，第4章“Internet 網的協議”。第6章“Telnet 和 NASA APACelink 系統”。第7章“Telnet 和 Medline 數據庫”。第8章“使用 Archie 查找文件”。第13章“剖析 E-mail 消息”。第19章“UseNet 和新聞羣”。第21章“Gopher 軟件系統”。第22章“WAIS：廣域信息服務器”。第23章“World Wide Web 軟件系統”等等。書中有更多的“字母借詞”，不再列舉。

這些夾在“中文”裏的語段是“英文”、還是“中文”？它們來源於“英文”，但是已經進入了、並且正在變成“中文”。正如“la cover-girl”（“封面女郎”）來源於“英文”，但是進入了、並且變成了“法文”一樣。也正如法國人見到“Franglais”（英法語）大為惱火，許多中國人見到“中文”裏夾進“英中文”（Chinglish）大為惱火。首先，不承認它。可是不承認照樣存在。於是罵它“崇洋”、“洋涇浜”、“不成話”“破壞了漢語的純潔”！“字母借詞”罵不倒，因為如果不用“字母借詞”將用甚麼來代替呢？“意譯”嗎？“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難期”。從音譯“萊塞”（台灣“雷射”）到

意譯“激光”費了十五年之久！又難又慢的“意譯”無法跟上信息化時代的速度。新一代的中國科學家沒有“罵祖宗”，但是實際需要使他們無法保持老祖宗的“語文純潔”。看來，數量很多的“字母借詞”不容易像“萊塞”那樣終於全部被“激光”所代替，而將是至少部分地像“雷達”那樣以“音譯詞”保存下來，並且以“字母借詞”的形式使用下去。中國正在進入科技時代，科技時代需要“字母借詞”。科技領域使用的“字母借詞”實際是國際通用的“科技符號”。

“字母借詞”是“外來詞”（借詞 loanword）之一種。它用“字母”構成，不用“漢字”構成。“字母”（拉丁字母）不僅屬於“英文”，自從有了“漢語拼音”以後，字母也同樣屬於“中文”了。日文用“片假名”寫成“音譯外來詞”。中文用相當於“片假名”的“拼音字母”寫成“音譯外來詞”。這些“字母借詞”天天在新一代中國青年的口頭上說，筆頭上寫。這“筆頭”可能是“鋼筆”，也可能是“電腦”。“字母借詞”現象今後還會發展下去。這是一次發生於信息化時代的不聲不響的“詞彙革命”。

“字母借詞”不僅進入計算機學術界，還進入了其他科技界，並且進入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大陸電視上沒有一天不看到“TV”，還有“BTW”，“ZTV”，“STV”，“YTV”等等。大家已經司空見慣。只有“MTV”出現以後部分被“音樂電視”代替了。可是“卡拉OK”大行其道。以自我封閉而出名的北京，馬路邊也到處可見“卡拉OK”。北京市整頓招牌用字，沒有聽說禁止“卡拉OK”。沒有見到“卡拉OK”改成意譯的“自娛歌廳”。從前只有“阿Q”不能譯成漢字，現在用字母書寫而不能譯成漢字的“新詞新語”多起來了。

另一種不聲不響的語文劇變正在進行，那就是小語種的迅速消失。

新聞報道說：在今後十年中全世界將有六百種語言從人類的口頭上消失。這使許多人聽了大吃一驚！太平洋裏的許多小島國家，在輪船時代還可以保住他們的語言和傳統文化，到了飛機時代就無法保住了。島民離鄉求學，改穿洋服，改說洋話，學成以後，不再回鄉，深恐別人知

道他們是土著。本土文化只有在“土著文化紀念館”裏才能看到了。二次戰後美洲土著從北冰洋到中美洲到南美洲，到處經歷新的動亂。求生之道是自動同化於主流文化，於是部落語言悄悄消失。有的國家提出保護“小語種”的行政措施。我們贊成保護“小語種”，正如我們贊成保護古迹和古物。但是，語言的共同化是無法抵抗的歷史進程。古已有之，於今為烈。

新興國家努力普及“國家共同語”，原來的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有被忽視而遲早消失的危險。發達國家的方言和少數民族語言面臨消失，已經是老問題了。英國的威爾斯語正在“搶救”。日本的方言稀少到難於尋覓的地步。歐洲共同體照顧小語種的圖騰情緒，諱言語言“一體化”，以“相互學習”代替語言的“一體化”。事實上多數人學習英語，因為它最有用處。有的發達國家已經在教育大綱中規定“掃除外語文盲”。“掃除外語文盲”的結果，很可能就是加強英語的國際通用性。

民族文化正在融合成為區域文化，區域文化正在融合成為國際文化。地球變小，語言變少。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外來移民，第一代主要說母親語，第二代說英語和母親語，第三代只說英語而不會說母親語。從歷史來看，語言一方面有同化趨勢，另一方面又有分化趨勢。例如，英語分化出美國英語、澳大利亞英語、印度英語等。中國的普通話，分化成為台灣國語、新加坡華語、上海普通話、廣東普通話等。但是，對國家共同語和國際共同語來說，分化力量微弱而同化力量強大。因為，同化在現代是用有計劃的教育工作來進行的。只有在社會發展緩慢的國家，例如中國和印度，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語言分歧現象一時難於更改。中國是多民族、多語言、多文字的國家，雖然也在“大力”推廣普通話，但是還沒有迅速“普及”的有力措施。可是在歷史上，同化趨勢明顯地勝過分化趨勢。例如，作為統治民族的滿洲族，經過三百年的自然同化，竟然未能保持住他們的語言。現在還能說滿洲語的滿洲人，只有到中國東北的窮鄉僻壤去找了。不同的是，中國社會變化非常慢，

因此語言和文字變化也非常慢。

上面談到詞彙的音譯化現象和語言的共同化現象，此外還有許多語文演變的新現象，都只有用孔先生的宏觀思考方法才能深入理解其中的必然和意義。這就是出版這部孔先生論文集的意義所在了。

**周有光於北京**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1995年5月22日

# 姚德懷序

一百五十年來中國社會各方面經歷了自古未有的大變化，社會、文化、教育、語文各方面莫不如此。一百年前，大家寫的是文言文，現在能寫文言文的人已屬鳳毛麟角了。一百年前，北京的販夫走卒都會哼上幾句京戲，現在京劇已屬曲高和寡而且瀕臨存亡關頭的所謂“高雅藝術”了。語文和語文教育方面，一百年來經歷的大變革有：清末的廢八股、設學堂（大、中、小學）、停科舉；進入民國（1912）後的制定注音符號、國語運動、白話文運動；解放（1949）後的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諸工作。

以上的變動，既由於客觀形勢的需求，也由於人為的推動，兩者互為因果。百餘年來，這方面的言論文章不計其數，其中有屬於較狹義的“文字改革”範圍的，也有屬於較廣義的“語文建設”範圍的。

本論文集收集了香港中國語文學會顧問、新西蘭 Waikato 大學孔憲中教授1975 – 1995年期間發表的現在屬於“語文建設”範圍的文章系列以及海內外學人對這些文章的反應。這些文章先後刊登在香港《抖擻》雙月刊，香港中國語文學會《漢字改革》、《語文建設通訊》諸刊物上。順便一提，現在通行海內外的“語文建設”這一名稱，就是在1982年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率先提出的。

1991年澳大利亞墨爾本 Monash 大學胡百華教授來到香港。他任教香港嶺南學院之餘積極參與了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理事會的工作，並任《語文建設通訊》主編。胡教授隨即感到，上述文章系列極有啟發性，並具啓先承後的重大意義，何不匯編成集？在各有關方面贊同之下，胡教授勇於承擔了艱辛的編輯工作。這就是本論文集編輯出版的緣起。

本論文集第一部分刊出孔教授的論文，第二部分刊出了各方面相應的回應或其他作者同一範圍的論文。各部分再以文章內容的性質來定先

後次序。例如第一部分 I - B2是孔教授的《綜合文字》，而第二部分 II - B1即是胡百華教授的《“綜合文字”C式》。

從目錄和內容可以看出，本論文集牽涉的範圍相當廣，這裏不可能一一細述。我這裏只引用孔教授在《漢字改革的兩條基本路線》（1984年）一文裏的一些話，以見他的觀點與一般人有些甚麼不同，以見他是如何以高屋建瓴之勢來觀察一些問題的：

漢字改革大辯論，一般是在下列幾個範圍內爭議。（A）

字母形式：拉丁字母呢？漢字式字母呢？還是拉丁加些新字母呢？（B）拼音形式：音節制呢？雙拼制呢？三拼制呢？還是音素制呢？（C）要加意符嗎？加多少？（D）要加聲調符號嗎？以拼音字母代表？還是另做符號？

我以為這四個通常的辯論範圍都不夠基本。無論處理甚麼問題，先要分別本末。假如不分本末，在皮毛方面爭論，一則荒費時間和精力，二則到頭來所得下的結論往往是錯誤的。……最近國內外似乎有所謂“民族派”和“拉丁派”的爭辯。所謂“民族派”似乎是指主張採用漢字形式字母的人，而“拉丁派”卻主張採用拉丁字母。我以為這是的確確皮毛的爭辯。

凡事要從基本入手，何況漢字改革。我們要問，將來新文字的任務是甚麼？我們當然想新文字“萬能”，但假如“萬能”是一個奢望，那麼我們要放棄哪一種“能”，保存哪一種“能”？哪一種是比較重要的任務，哪一種較為輕要？

孔教授接着引入了“實錄派”和“引導派”兩個概念：

……以“文字的主要功能是實實在在記錄語言”作為基礎思想的文改派別，可以叫做“實錄派”。既然現用漢字在記錄現用漢語這方面成績不錯，而缺乏的是部件化和拼音化，那麼文改實錄派便順理成章應該以現用漢字為出發點，加以改良，

使它成為部件化和拼音化便了。

與實錄派對立的是“引導派”。引導派承認新文字應當承擔起記錄現用漢語的任務，不過覺得現用漢語有許多缺點，（例如同音字多，同音詞也多。以聲調來分別字音不夠明確。漢語音節太少。詞結構鬆弛。語法不夠嚴謹。缺乏關係代詞等等。）因此認為新文字應該以引導漢語走上某改良道路上為主要任務，記錄現用漢語只是次要。假如二者有所衝突，那便以引導為先要任務。實錄派比較保守，引導派比較冒進。這個是很明顯的。實錄派着要在文字實實在在地模畫和保存現用漢語，引導派着要在以文字來改良和豐裕漢語。將來漢語在新文字引導下可能完全改變面貌，差別可能不下於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分別。

我認為以上這些話可能是孔教授大多數論文的出發點。如果讀者能沿着這條思路來讀本論文集的文章，再對比自己（或其他人）對這些問題的想法，必定會大有收穫。

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孔教授各時期的個別觀點偶有前後矛盾之處。這是不奇怪的。在二十年這麼長的時間裏，每個人的想法都會有所改變。本論文集刊出的文章，從存真的原則出發，除了個別錯別字外，都保存了原貌，並無再作任何改動。對這些文章內容的歷史進程有興趣的讀者，大可以依照 E, D, C, B, A 的次序來倒讀的。

\* \* \*

本論文集是由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出版。我作為學會的創辦人之一和現任主席，作為上述諸刊物的創辦人之一和長期編者，理應為論文集作一簡單的介紹如上。但是由於我與孔教授多年來志同道合的關係以及他對學會和上述諸刊物的一貫支持，我還想從較個人的角度來寫一些回憶以及編輯出版本論文集的緣由。

1974年《抖擻》雙月刊創刊。創刊初期，編輯部就收到了一些現在

屬於“語文建設”範圍的稿件。《抖擗》是一份綜合性的刊物，當時編輯部內部對是否應該刊出這類文章是有不同意見的。一來這類文章內容可能極富爭論性，如何取捨，頗成問題。二來排版方面確有其特殊的困難。第三，擔心一般讀者是否會對這類文章感興趣。最後編委同人終於達成共識：可以撥出篇幅給大家爭鳴。這樣就開創了當時少有的語文園地，並且由《抖擗》初期的散篇文章，發展到後來的專欄“語文論壇”，到了八十年代再過渡到香港中國語文學會的《語文雜誌》、《漢字改革》、《語文建設通訊》等刊物。二十年來，刊出的文章不知不覺間竟然匯集成一條抽刀不斷的關於語文建設的文字川流。

做編輯，尤其是“和寡”刊物的編輯，是苦事，但有時也是一件極大樂事，那就是忽然有“知音者”來“和”或“鳴”的時候。《抖擗》創刊不到一年，遠在新西蘭的孔憲中兄就來稿加入了“和鳴者”之列。這對我們是莫大的鼓舞。

我和孔憲中兄算是香港大學的先後同學。但當他在1960年左右在香港大學求學時我已在德國的 Göttingen 了<sup>[1]</sup>。後來在1968-69年期間我們在香港大學數學系做過一年的同事。那時不會想到，數年之後竟然在語文建設討論的基礎上，成了志趣相投的同志。更想不到，後來在創辦學會，創辦其他刊物的時候，憲中兄在關鍵時刻都作出了關鍵性的推動和支持。憲中兄先後鑽研過數學、物理、邏輯學、數理哲學，最後是專門研究科學哲學。以這樣的背景，說他是理想主義者，雖不中亦不遠矣！二十年來，他就是從理想主義者的角度從各方面來研究漢語文，提出一系列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也指出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每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字都是千萬年積累下來的兼有交際功能和蘊含民族文化特徵的極為複雜的體系。它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十九世紀之前，漢語文主要是自力的發展，受外界影響較少。十九世紀、二十世紀，漢語文受西洋他力的影響比較大。到了二十世紀中期，忽然出現了“現代漢語”這個名稱。這個名稱本身就表示着漢語文已經經歷了劇烈的變動，並且也還處在劇烈變動之中。要變，怎樣變，

可能就需要理性的引導。“引導”這兩個字，出自上述孔憲中兄的一篇文章。“引導”，也可以說是他的一個基本態度。

孔憲中兄的一個出發點是敢說，言人之不敢言，這包含在他的“罵祖宗”三個字裏面。“罵祖宗”三個字落得重。他是語重心長，希望國人省悟，在語言文字問題上採取更開放的態度。這裏得加上補充：在現實生活裏，孔憲中兄是翩翩君子，也是 gentleman，也是牛津劍橋型學人。他從不惱火，永遠以學術態度討論敏感的問題。

“引導”也需要原則和方向。甚麼是孔憲中兄的原則和方向。他苦口婆心地希望漢語文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這句話出自牛頓<sup>[2]</sup>。牛頓本身是公認的“巨人”，但是他自己謙虛，說他的成就乃是建築在先驅者如 Galileo (伽里略) 和 Descartes (笛卡兒) 的肩膀上。孔憲中兄希望，漢語文能夠吸收其他語種的長處，在已有的基礎上，再上一層樓。

孔憲中兄二十年來發自遙遠的新西蘭的諍論，不斷地引起了海内外學人的興趣和關注，不斷地引發出熱烈的討論。兩年前胡百華兄慧眼看出，如能把這些討論和反討論蒐成專集，不但是一個及時的總結，也將有利於討論的繼續。胡百華兄學習研究的經歷，半個多世紀來，由大陸而台灣，而至美國、澳大利亞再到香港，我說他獨具慧眼，是有事實根據的。現在論文集終於成型了。這是傾注了多人心血的作品，通過多方面人士、機構的協助才能實現，這在“孔序”、“胡跋”裏都有詳細說明，這裏就不重覆了。最後讓我引錄一首千古常新的唐詩供大家咀嚼、玩味：

### 登鶴雀樓

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姚德懷**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主席)

1995年6月

**注釋：**

- 
- [ 1 ] 哥廷根，季羨林先生二次大戰前後曾在此整整十年鑽研梵文、巴利文、吐火羅語。他在《聽詩》(1936.2.26)一文中稱之為“哥廷根”，在《尋夢》(1936.7.11)一文中改稱“葛廷恩”，在《德國學習生活回憶》(1981)一文中又改稱“哥廷根”。現在也稱“格廷根”、“格丁根”。
  - [ 2 ] 原文為：If I have seen further it is by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 見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 , 4th ed. , OUP, 1992, p. 493.